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2026年9月11日 星期五 责编:刘云云 编辑:孙瑜 美编:段博伟 TIANJINDAILY 天津日报
E-mail:liuyunyun628@126.com

探寻严复的精神世界

——读赵白生《严复:难为世界人》有感

欧阳哲生

严复与天津关系至为密切,他的一生(1854—1921)在天津的时间有四段:第一段(1876年8月—10月),因李鸿章奏请,随舰队北上的严复等四人留在北洋当差,时间约两个月;第二段(1880年8月—1900年7月),供职北洋水师学堂,历任总教习、会办、总办;第三段(1901年5月—1904年4月),严复应张翼邀请,出任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华部(设于天津)总办;第四段(1908年8月—11月),严复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之邀,聘为北洋新政顾问官,约三个月。民国初年,特别是1916年以后,严复离开政界后,和家属常来天津小住。天津是严复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1908年,严复曾写信给夫人朱明丽称:"吾系三十年老天津。"吐露他与天津的关系时长累计在三十年以上,可见严复与天津关系之深。

张绍祖在《严复在津活动遗址》一文中开列了20处遗址,包括:北洋水师学堂、大狮子胡同故居、天津俄文馆、《国闻报》社址、大沽口、海大道德源里故居、开平矿务局监督张翼宅邸、开平矿务局、直隶学务公所遗址、北洋女子公学、李公祠、孙家花园、大王庙孙家旧屋、北洋客籍学堂、德义楼、长发旅社、芙蓉馆、裕中洋客店、天津嘉井处、朱明丽夫人居津地。由此可见严复在津活动范围之广。

2025年,笔者所著《严复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首版)经过大量增订完善,时隔三十余年,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是该社继《严复全集》(23卷本)之后,"严复系列"出版版图的又一延伸。其实在我的这本严复传记之前,天教社还曾在"阅读天津"丛书第二辑"群星"系列中,出版了一本角度独到的"严复小传"——北京大学赵白生教授创作的《严复:难为世界人》。

约请赵白生教授来为严复作传,这是一个合适的选择。赵先生是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传记研究,对传记的写作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有此写作传记的机会,可以实践他的传记理念。赵先生还是北大外国语学院教授,对英美文学、翻译文学有过长期的教学经验。严复是翻译家,且是英译中的翻译家,又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工作过,由赵先生来写严复的传记,比起非外语专业的学人、非北大的学者,他与传主更有亲近感、更能产生心灵上的感应和共鸣。赵先生走遍世界,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丰富经验。严复是走向西方、走向世界最早一批中国学人中的一员,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是中国近代"西学第一人",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赵先生研究严复,以一个21世纪的跨文化人身份,与一个19世纪走向世界的先贤展开对话——跨越时空,可以透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恒在与演进。赵先生撰写严复传记,可以说是为严复研究增添了新的生力军。

将这本《严复:难为世界人》完整读过,我感觉赵先生着实下了大气力——不仅表现在他阅读了《严复全集》,而且注意吸收现有的严复研究成果;在完成这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后,他按照自己的传记理念,设计了一套别具一格、独出心裁、不同于此前任何一部严复传记的写作思路。

赵著《严复:难为世界人》,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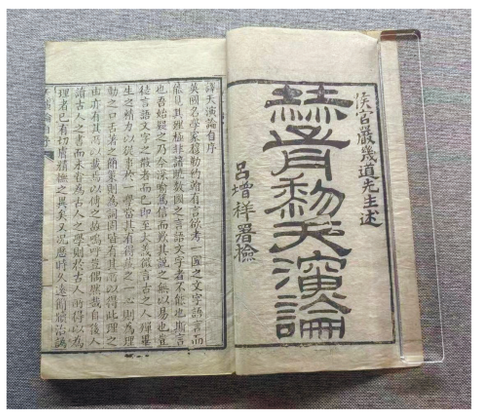
传记笔法、文字脱俗;画龙点睛、征引得当;见解独特,分享心得。

这部篇幅不大的传记,放弃了平铺直叙生平事迹,而是抓住最能反映严复精神风貌和思想个性的某些方面,如严复自传、严复在天津、严复的翻译成就、严复的启蒙思想、严复的教育思想等,来表现传主的思想与个性。可谓剪裁得当、有血有肉、伸缩自如,读来饶有兴趣,引人入胜。

以我对严复之习得,略举赵传之独具卓识。

严复的历史地位来自他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严复是翻译家,他翻译的西方系列著作,使其暴得大名。这些著作向国人推出了一个不同于中学的西方社会科学世界。严复翻译的目的是思想启蒙,实际上他是最先发出维新变革呼声的思想家——1895年2月至5月,他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五篇政论文章,最先发出维新变法的呼吁。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严复不是一个没有缺点、没有问题的人。他有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严复升迁不利、不得重用的个人原因。严复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早在天津时两人即相识,1909年袁世凯被清廷开缺回河南老家,严复为之鸣不平,感叹清廷心胸狭窄,认为"世凯之才,一时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因此更得袁的信任。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被清廷起用重新出山后,严复即被其派往南方斡旋。1912年,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即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作为回报。以后,严复任总统府顾问,在欧战期间为袁编译《居仁日览》。严复被列名为筹安会虽非其所愿,但也不是偶然。他在清末有君主立宪的思想基础,在民初有主张开明专制的思想倾向。当然,严复晚年对袁的才能也有他个人的看法,认为袁不过是"一督之才",对袁复辟帝制没有信心,所以他借病推辞、不愿出面。



严复在天津翻译的《天演论》

严复的职业是海军,他的这一身份常被人们忽略,故他的军事思想较少被论者关注。严复生活的年代正是帝国主义时代,战事频仍,一般的文人士大夫谈兵议战,因缺乏实战经验,书生意气、慷慨激昂,并无多少实用价值。严复作为职业军人,对战争有着特殊的敏感性,他纵横捭阖、视野宏阔,对战争内外、军事与政治、军事与国力的关系都有相当的观照,他的此类论述,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严复履职北洋水师学堂,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法战争马尾海战福建水师遭受重挫,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战役、威海卫战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天津时摧毁北洋水师学堂设施,这些都给清朝海军以毁灭性打击,也对严复的心灵造成重创。1910年冬,清廷成立海军部,严复被授以"协都统"职衔;1911年又被授海军第一等参谋官。严复逝世后,陈宝琛作《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载《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称赞严复"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则反而为文学掩矣",有意提醒人们严复的海军职业身份。

近代战争激发了中国人的思想,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尚武观念兴起。近代中国的战争论述是近代思想最具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组成部分。严复的军事思想包括:战争论,军事教育(海军教育),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战争文明论。近代战争有内战与外战之分。近代以来流行的《曾胡治兵语录》是内战论,而严复的战争论是外战论,包括对近代战争的一体化思考、近代战争的性质、战争与文明关系的论述,等等。

欧战将国人的视野带向世界,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中国新思想界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欧战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新的分化: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展开论争。欧战是中国调整与世界(西方)关系的契机,也是中西关系的一个拐点,战后中国获取战胜国的资格,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严复对欧战的观察和他推动中国参战的主张,颇有思想价值;他对欧战的论述颇具近代意义,具有通透的世界视野和文明比较。如果没有实战经验,没有对近代战争技艺的了解,仅凭感觉纸上谈兵,就不会有多少实用价值。

严复的晚年思想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民国成立后,严复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等职,受所任职务和历史关系的限制,其晚年在政治立场上明显站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一边,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相对立,在思想上呈现出保守的一面。与此相适应,在中西文化观方面,严复亦别树一帜,提出诸多与国民党、共和党,甚至新兴的新文化运动不同的思想主张,其保守性表露无遗。严复大力倡导发扬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传统,赞成康有为提出的立孔教为国教之说;批判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思想,明显表达了对法国式的革命思想和民主传统的排斥,这既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构成对立,也与梁启超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呈现异趣。严复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进展,如在欧洲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等,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反对甚至非议态度。目睹欧战惨状,严复悲叹:"欧逻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暴残酷,于古无闻。"他对西方文明的理想之梦也随之破灭,"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

严复晚年的思想在现实社会并无影响。他去世后,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刊物《学衡》将他与学生熊纯如的来往通信悉数刊出,表达了对严复晚年思想遗产的珍视,严复思想的两面性由此得以展开:其早年的西学思想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力量的思想武器,其晚年思想遂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严复思想前后的歧异、反常现象,给后人留下了一长串疑问,引起学界连绵不绝的反思。

这是一本精悍而可读的传记,能在短小有限的篇幅内,做到有序梳理而生疑,有疑而生发思考,思考而深入浅出地为读者道出、讲明——正是赵白生教授这部独特的严复小传的功力和魅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津派文化大家谈

河海文化汇天津(十一)

漕浪龙旗逐海河:历史上的海河龙舟竞渡

刘凤华

天津龙舟竞渡扎根于海河漕运体系。明初至清中期,大量江浙、皖赣船商、盐工、漕户迁居津门,他们将家乡端午赛龙舟、祭屈原的习俗带入码头街巷,与本地船帮习俗融合,成为津门龙舟重要的文化源头。早期海河上的龙舟,主要是用作游乐和观赏,而非竞渡比赛。"天津八景"之一的"广厦舟屯"就是清康熙年间在北安桥南、海河西岸建立的皇家船坞,坞内停泊龙舟十几只,专供皇帝来津游览之用。戴愚庵《沽水旧闻》中记述:"天津初无竞渡之戏,乾隆下江南时,驻跸海光寺,会端阳节届,无以为欢,同城文武忧之。旋由操海船业者诸家,仿照三江斗龙舟办法,作竞渡之戏。选梨园中善武技者得十人,衣彩衣,在舟上作种种武技。舟作龙形,上悬秋千皮条之属。献技者作诸般身手,使观者惊魂动魄。寺固濒水,即于寺前水中作戏。乾隆御览大喜,赏马蹄金十锭、黄带子十根,赐奉旨竞渡。由是竞渡之戏大盛……每至端阳,出而作戏,高标'奉旨竞渡'字样,气焰之高,不可一世。"赏赐黄带、御赐"奉旨竞渡"的典故,表明三岔河口的龙舟活动获得官方允许,规模逐渐扩大。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完颜麟庆著,汪春泉、陈朗斋等画家绘图的《鸿雪因缘图记》中《津门竞渡》一篇,记载完颜氏在五月初四经过天津三岔河口望海楼下,"见龙舟旗帜翱翔,游舫笙歌来往,虽稍逊吴楚之风华,而亦饶存竞渡遗意。"随即作诗"龙舟齐趁午时开,喜见扬髻棹尾来。望海楼前争夺锦,是谁真个解怜才",生动描绘午时开赛、龙舟争先、终点夺锦的完整赛制,成为记载近代天津龙舟较早的图文史料。光绪年间成书的张焘《津门杂记》明确记载海河"五月端午,有龙船戏",证明龙舟比赛已是完全融入天津岁时体系,成为津门端午的重要节日活动。

杨柳青木版年画《闹龙舟》

由上可知,清道光年间至光绪初年,是天津龙舟竞渡的黄金时代。光绪年间多部地方志将三岔河口龙舟竞渡列为津门八景类特色景观,足见其地位。不同于江南以村镇、宗族为单位的传统,天津龙舟队伍依托码头社会组织构成。漕运盐商出资置办龙舟、彩饰与奖品,各水会、救火会、挠钩会等组队参赛。水会本是天津民间消防互助组织,成员常年操舟治水,臂力强健、配合默契,是龙舟竞渡的主力;沿河村镇、码头脚行、商号伙计各自组队,每只龙舟二三十人。这种以商帮、行会、公益团体为核心的参赛模式,是天津龙舟区别于南方宗族龙舟最鲜明的北方码头特征。除了比赛之外,天津龙舟独具水上杂戏表演特色,部分彩龙舟不参与比赛,专设秋千、软索,武生在行驶的龙船上腾空翻跟头、舞刀弄枪,延续乾隆年间观戏赏舟的传统,兼具竞技与娱乐双重属性。

龙舟竞渡在每年五月初四预演、初五正赛,参赛龙舟有百艘上下,形成一套完整、隆重的仪式体系。在清末天津开埠以前,参赛队伍以漕帮、盐船行会、水会等为主,多由盐商、船商出资打造龙舟。龙舟形制兼具南北特色,以漕船为基底改造,长三丈有余,船头木雕龙首,披红挂彩,悬挂"奉旨竞渡"黄旗;船身绘有五色水纹,两侧悬挂红绿旌旗,上书各会、商号名号,船头竖大旗,醒目绣"奉旨竞渡"四字。船身可容纳二三十名划手,船头立鼓手、船尾设舵手,另有锣手、号手配合。端午前一日,龙舟齐聚三岔河口举行"祭龙"仪式。船主、会首携带粽子、雄黄酒等至望海楼前河滩祭拜屈原与河神,祈求汛期平安、漕运顺畅。仪式结束后,龙舟沿河巡游,途经估衣街、北大关沿河码头,沿街商号燃放鞭炮、抛撒彩帛犒劳划手。端午正午开赛,望海楼下鸣放铁炮三声,河面百余只龙舟分列赛道,竞赛开始。两岸望海楼、崇禧观高台挤满百姓,官绅租赁画舫泛舟河面,丝竹鼓乐与龙舟锣鼓交杂,岸边小贩、杂耍、香摊沿街排布,形成集祭祀、竞技、商贸、休闲于一体的全城共享盛会。竞渡核心环节为"夺锦标",终点悬挂绸缎锦幅,率先抵达者可夺得锦缎、锦标与盐商捐赠的银钱、绸缎、酒品等奖赏。

1860年天津开埠后,九国租界沿河落成,海河龙舟进入近代转型阶段:一方面,租界洋商、传教士旁观龙舟竞渡,西式报刊开始零星记录海河龙舟竞渡;另一方面,传统龙舟风俗的生存环境逐步受到冲击,租界航运、码头分割了原有河道,洋轮往来挤占竞渡水域,而西式现代体育、新式休闲方式涌入,也使得市民审美与娱乐拥有更多选择。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天津,三岔河口商铺、码头焚毁大半,船行、水会器械、龙舟彩船多遭损毁,此后多年未举行大规模龙舟竞渡。1918年,海河裁弯取直工程的实施,改变了三岔口的地理面貌,原有开阔河面被改造压缩,旧望海楼前天然竞速水域消失,摧毁了大型龙舟比赛的地理条件。而民国初年社会风气变革进一步挤压龙舟赛事的生存空间,官方不再支持端午龙舟竞渡,盐商势力衰落,经济支持减弱,民间无力承担各项巨额开销,年轻人也有郊游、上学等更多选择。

此后,天津民间端午水上活动出现分化:底层船民、近郊村民仅在支流浅滩小规模戏水,城郊穆家庄、西沽、柳滩等临水村落,船民依旧保留简易龙舟和端午龙舟习俗,在海河支流浅滩开展小规模竞渡;而新式社团则改造传统龙舟竞渡活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会、教会学校、租界的西人俱乐部开始主导新式水上活动。1929年,天津青年会尝试复兴水上活动,成立"端阳泛舟会",放弃传统雕刻龙形大船,改用统一租赁的平底游船,取消激烈竞速夺锦,弱化祭祀屈原、祈福漕运的传统内涵,增加集体游戏、演讲、野餐、合唱等环节,同时还推出不限端午时节的付费水上游览项目,票价5角、1角5分大洋不等,可乘船至北洋大学、南开大学等地。《益世报》《北洋画报》将此泛舟会定义为"文明端午活动",区别于旧时喧闹的传统竞渡。租界的俱乐部等机构和侨民,则在海河租界段举办西式皮艇、赛艇和游泳比赛,进一步分流受众。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战事频发,民生困顿,海河之上再无官方、商团组织的龙舟赛事,仅有少数近郊村镇的小型木船简单巡游,规模微小,不再具备全城性民俗盛会属性。

天津独具北方码头特色的端午龙舟竞渡,既是见证天津近代城市变迁的活化石,更是漕运文明、南北移民交融、近代城市社会百态的缩影。如今海河龙舟赛事再度复兴,正是对这段近代津门竞渡最好的回望与接续。

沽上丛话

风吹稻花香两岸

金学钧

刘秀珍资料图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演唱者、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离开了我们,但她饱含深情的歌声却永远回荡在神州大地。盛夏时节,蓟运河水在蓟州区下仓镇少林口村南翻卷着浪花,一路向东南流去,两岸的稻田碧浪翻滚。这里就是《上甘岭》中女卫生员的原型之一、抗美援朝女英雄刘秀珍的家乡。

1932年11月,刘秀珍出生在少林口村一个贫苦家庭,全家4口人。父兄以在蓟运河上捕鱼和做短工维持全家生活,她是在苦水中长大的。抗战期间,年幼的刘秀珍亲眼看到日本军队的残暴,也感受到父亲刘琨和乡亲们为八路军运送粮食弹药、隐藏枪支的抗日热情,一颗革命的种子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埋下。刘秀珍10岁时,父亲为宝坻一家地主家割麦子,因劳累和天热喝了河沟里的脏水,得了重病离开人世。不久,哥哥为八路军送粮,被日本兵打断了右腿,半个月后也去世了。母亲大病一场,继而也撒手而去。成为孤儿的刘秀珍跟着叔叔生活,并到别的村当丫环维持生计。1946年秋,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刘秀珍结束了做丫环的苦难生活,回到了少林口村。回村以后加入儿童团的刘秀珍,对解放军有种特殊的亲近感,于是,她决定去当兵,拯救受苦的人。

1947年5月,刘秀珍如愿在少林口村参加了解放军,成为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一所的医护战士,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1950年秋,刘秀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后勤一分部基地医院护理排长。这年12月5日,刘秀珍医疗组在朝鲜新月岭护理7名重伤员,因为隐蔽重伤员的山洞太冷,刘秀珍把他们转移到山沟里朝鲜老乡的空房子里。刚刚安顿好,就遭遇了敌机轰炸,燃烧弹击中了病房,房子着了火,敌机还不断向地面扫射。刘秀珍冒着枪林弹雨,不顾身上的火苗,在房子烧塌之前,安全转移了重伤员,自己却晕倒在地。1951年8月初,刘秀珍所在的部队医院进驻朝鲜北部的盘龙里,夜间突发洪水,她带领全排13个战士把100多名轻伤员和90多名重伤员分别转移到树上和高坡上,直到医院总部派船接应,而排里一位干事、一位护士和一位理发员为抢救伤员被洪水夺去了生命。在朝战斗期间,志愿军后勤部先后授予刘秀珍"二级模范""模范护士"等光荣称号,她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六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她一级、二级国旗勋章及独立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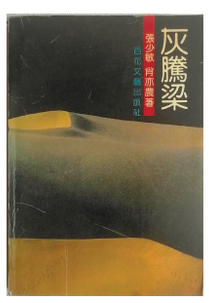
1951年9月下旬,刘秀珍随志愿军战斗英雄国庆观礼代表团回到国内,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接见。1954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刘秀珍的事迹为基础,制作了纪录片《一切为了伤员》,她也成为电影《上甘岭》中勇敢的女卫生员原型之一。1985年10月,刘秀珍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团成员,再次回到朝鲜,受到了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并被授予自由勋章和友谊勋章。

1990年,蓟县(今蓟州区)政协工作人员吴竹亭、刘春分别到北京空军某部干休所和刘秀珍家里采访了她,并将她的事迹写成文章发表在《蓟县文史资料》上。1997年3月13日,已离休的刘秀珍回到家乡,在蓟县一家影剧院为中小学生作革命传统报告,并把传记《战火中走来的女兵》赠给家乡人民。刘秀珍在捐赠仪式上简要回顾了自己五十年的革命生涯:"回顾自己的一生,是共产党指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是人民哺育我成长为一名解放军干部。请家乡人民放心,我一定把自己晚年的全部智慧和力量,都贡献给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永远保持战争年代的拼劲儿,为家乡人民争光,为祖国再立新功!"她的一席话,令在场的家乡亲人格外感动。次年,刘秀珍因病去世,享年66岁。

满庭芳 第五四八七期

忆张少敏先生

王雅鸣



我的书橱中珍藏着张少敏先生赠予的他与作家肖亦农的小说合集《灰腾梁》。作品文字厚重,风格独特,反映了黄河湾这块古老土地的生活风情和历史变迁,具有深广的社会认知价值和凝重的艺术魅力。我曾反复拜读,汲取精神力量,受益匪浅。一转眼,张少敏先生去世一年多了。四十多年前,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进《新港》编辑部,正是得益于他的悉心指点,让我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作为文学爱好者,写了许多内容稚嫩、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那天,我带着小说手稿叩开了《新港》编辑部的大门。一位中等身材、仪表儒雅的中年人接待了我,他就是时任《新港》小说组副组长的张少敏先生。尽管工作繁忙,不时有人找他,但他还是耐心询问了我的创作经历,在认真审读了我的小说后,留下了一篇作品。没想到,1981年7月号《新港》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小说《把关》。

从此,我走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创作道路。

彼时,我的主业是当记者跑新闻。没想到,《新港》发表我的作品后,在我们当地竟产生了一些反响。时任中共汉沽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汝荫听说后,让人将那期《新港》杂志送到他的办公室。韩汝荫年轻时也是一名文学青年,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大公报》《民生报》等报纸上发表了大量进步诗歌。可以想见,作为地方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看到文学事业后继有人,他心里是多么高兴。

随着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数量增多,我开始尝试中篇小说的创作。一次,我将一部中篇小说寄到《天津文学》编辑部,已担任主编的张少敏先生读后,指出作品中引用的一个历史事件的错误,这还是通篇作品的"核"。正是这一硬伤,成为作品的败笔。这件事一度影响了我的创作情绪,也有些灰心,认为自己不是搞文学的料。然而,我却因此认识到张先生的可贵品质——没因为我是老作者而放松要求,更没因为我的作品不过关而降低对刊物的标准。

上世纪90年代,天津文学创作进入繁盛期,我的创作视角开始由都市题材向渔村题材转变,陆续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一批反映盐渔生活的作品,产生了一些社会影响,也有了些许知名度。特别是1998年3月,和平、东丽、汉沽三区小说创作笔会在汉沽举办时,我向前来参会的《天津文学》主编张少敏及多位作家汇报了短篇小说《放船》的创作构思,对主人公的英雄壮举进行了描绘,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感染了与会者。

记得张少敏先生在肯定这篇作品生活气息浓郁、题材新颖和人物形象鲜明后,特意告诉我:"作家一定要植根生活,写熟悉的生活,作品要出彩,在写出有质地的作品上下功夫。"一席话令我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近三十年过去了,仍音犹在耳,铭记心间,成为我创作的动力。当年的《天津文学》8月号上,如期推出了我的短篇小说《放船》,次年作品荣获天津市"东丽杯"短篇小说创作一等奖。这些成绩的取得,给我带来极大的鼓舞,让我增强了创作好作品的信心和决心。

汉沽人杰地灵,涌现出许多有才情、有潜力的作者,他们扎根生活,努力创作,但又苦于找不到发表的园地。我发现一位年轻作者的短篇小说写得很棒,故事生动,人物性格鲜明,是个好苗子,有培养的潜力,如果坚持写下去一定会有所成就,于是,我将其引荐给了张少敏先生。见到新作者,他很高兴:"你们稍坐一会儿!"说完拿着稿子径直进了对面的办公室。大概十几分钟后,他出来抖着手里的稿子说:"稿子不错,放我这里吧!"几个月后,这位作者的短篇小说《秋风可语》在《天津文学》上发表,反响很好。张少敏先生这种不注重名气、积极扶持新人的伯乐精神,令我十分敬佩。

后来,张少敏先生担任市作协相关领导职务,工作相当繁忙,但我们难以忘怀他待人真诚的品质和热心扶助作者的精神,所以,只要去市里出差,总要去看一眼他。他谦和待人的神态和儒雅和蔼的面容,让人感到他既是一位作风务实的领导,又是一位慈祥的兄长。

从1981年与张少敏先生相识,见面不过十余次,其间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漫长时光,但张先生温文尔雅的文人气质、对朋友至真至纯的优秀品德,没有因时光流逝而被淡忘,我们俩也没因不常见面而生疏。反而会时时想起,激励我在创作之路上不断前行。

题图:张少敏、肖亦农著《灰腾梁》书影